

「三乘五」的迷題

—圖書館目錄卡片之發展及其型制標準之演進

宋兆霖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圖書館之源起，肇因於人類延續知識傳承之實際需求。文明的進步乃經驗與知識的累積所致，而經驗與知識的累積往往存在於圖書館典藏之文獻圖書。作為知識與使用者之間的橋樑，圖書館的首要任務，在於備置良善的書刊管理機制，並提供完妥的目錄檢索工具，以期館藏獲得充分利用。自古以來，圖書館文獻典藏與知識播揚功能之發揮，即藉由某種型式之目錄或書目而達成。圖書目錄的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中外皆然；吾人熟知的卡片目錄僅為其諸多型制之一。卡片式圖書目錄是十八世紀西洋文明的產物；它的出現象徵著圖書館目錄演進史中另一波興替更迭的開始——十六世紀中葉以來即盛行的手抄式、書本式目錄自此走向式微之途。時至今日，卡片目錄以其多元化的檢索方式，已使圖書館的館藏參閱工具趨於完備，堪為最具時效性、使用率最高、且最易於維護更新之書目管理系統；然大眾在受用其檢索效益之餘，可曾思及其發展歷程？長約三英吋、寬約五英吋之卡片規格如何演變？它又如何成為全球圖書館目錄卡片之標準？本文旨在簡述卡片目錄自十八世紀以來型制標準之演進及相關規格之發展，或可為吾輩圖書館從業人員與時常使用圖書館的人士參考。

一、導言

在現今知識爆炸的時代，任何具有圖書館使用經驗的人士，當不難體會卡片目錄在資訊檢索過程中的重要性。卡片目錄

之所以為人稱作「圖書館的心臟」，即在於它開啟了通往浩瀚知識寶庫的門鎖。事實上，圖書館設置卡片目錄的最主要目的，即在於解答使用者如下疑問：館藏中有某書否？有某人的著作否？有某類的書刊否？自古以來，圖書館的主要社會任務不外乎書刊冊籍之徵集、典藏、及維護，並提供各種服務，以促進資訊之流通與利用；其相關作業推展之順利與否，則取決於書目整理控制系統之維繫。吾人所熟知的卡片目錄正是最具代表性的圖書館書目整理控制系統；經由作者、題名、與主題等款目之排比羅列，卡片目錄充分反映出圖書館的典藏內容。由於此一系統的存在，資訊檢索不再如大海撈針般地困難，而圖書館資源亦得為讀者充分利用。

無庸置疑地，卡片目錄僅為自古以來諸多圖書典藏的書目型式之一。時至今日，雖然資訊電腦化的風潮為編目檢索作業帶來了革命性的衝擊，傳統卡片式目錄卻仍為圖書館界最常見、最具時效性、使用率最高、且最易於維護更新之館藏書目管理系統。定義上，卡片目錄係由標準規格卡片依據特定方式排列而成的圖書館藏書目錄。目前圖書館界通用書目卡片之標準規格為高二·九五英吋（七·五公分）、寬四·九二英吋（一二·五公分），亦即所謂「三乘五」的卡片；各單一卡所呈現者，悉為依據標準編目規則著錄之相關書目資訊（註一）。在此值得注意者，係「標準」一詞本即隱含了由「百家爭鳴」而止於「擇一而行」之發展進程；因此，在探究圖書館卡片目錄演變時，吾人不禁要問：圖書館目錄用之「三乘五」書目卡片源於何時何地？除了「三乘五」卡片之外，是否尚有其它型式之卡片可供當時的圖書館從業人員選擇？「三乘五」的型制如何演進？它又如何成為全球各圖書館的一致遵循的標準？

卡片式圖書目錄是近世西洋文明的產物；它是歐美圖書館事業發展上的一項重要成就。因此之故，筆者在尋求上述問題解答之時，必以西方圖書館學相關文獻為參考重點。我國文明源遠流長，雖然典籍之興之盛，由來尚矣，且校讎目錄學的發展——自孔子編次古代文獻詩歌，劉向、劉歆撰《別錄》、《七略》開其端，以次鄭樵「通錄古今，兼記有無」作《藝文略》、紀昀修纂《四庫全書總目》，成書目著錄之盛舉——已有二千餘年悠久歷史，歷代公私藏書目錄之型制概以書本式目錄為大

【註一】· Landau, Thomas (ed). *Encyclopedia of Librarianship*, 3rd rev. ed. (New York: Hafner, 1968), p. 90 見 Catalogue and Catalogue card 款。

宗；卡片式書目著錄方法之沿用，則屬罕見。雖然南宋李濤在編纂《資治通鑑長編》時，曾以「卡片輯錄資料」，並設置「十只櫥櫃，每櫃有二十個抽屜」，其主要目的「僅僅是用來個人記錄資料，作為查閱和編纂……的資料檔」〔註二〕；因此，在性質上，李氏所用之資料卡片與本文所稱之目錄卡片實有極大差異。清末光緒年間，新舊思潮交替；在變法維新之士倡議下，新式公共藏書樓（圖書館）漸次興起〔註三〕。另一方面，西學東近已蔚為趨勢；由於內容「愈出愈新，莫可究詰」，其編目著錄「匪特七略不能復，即四部亦不能賅」〔註四〕。及至「五四」愛國反帝運動以及知識界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導入中國〔註五〕，經修訂補充，兼容古典目錄學傳統，我國清末民初圖書典藏著錄「各行其定，兩不相師」之混亂現象始得有所突破。據目錄學家呂紹虞先生論斷，西方卡片式藏書目錄之傳入中國，即在此圖書分類體系變革之際；當時，全國各圖書典藏機構「除了編印書本目錄之外，（亦）普遍採用了卡片目錄」〔註六〕。

二、卡片目錄興起前之西方圖書館藏書目錄

文字與文獻記錄的出現，是人類由野蠻步入文明的重要指標。當人類領略知識經驗的延續，已非口耳相傳所能竟其功，並發展出必備的書寫文字與材料，文獻便即形成。隨著文獻記錄的增加，人類面臨的問題，則為如何將之妥善收集、整理、與保存，以為利用；圖書館即是為因應此一需求而產生。西方圖書館事業發展迄今，已有近五千年的歷史。西元前三世紀，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王朝，以大批泥板文獻，於今伊拉克巴格達南部，建立了吾人目前所知最早的圖書文獻收藏之一。西

【註二】：張玉麟，〈簡論圖書館卡片目錄的產生和發展〉，《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三期（西元一九八七年），頁五十九至六十三。

【註三】：張錦郎，〈清末的圖書館事業〉，《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六卷第二期（民國六十二年九月），頁一至十九。

【註四】：李瑞良，〈過渡期：晚清〉，在其《中國目錄學史》，初版（台北：文津，民國八十二年），頁二二九至二六九。

【註五】：李瑞良先生以為，「杜威十進分類法」之傳入中國，係源於宣統元年（西元一九零九年）孫毓修氏於《教育雜誌》所作之引介；見【註四三】。呂紹虞先生則以為，歐美各國圖書館分類法之導入中國，當在「五四」前後，而其中影響最大者，為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見【註六】。

【註六】：呂紹虞，〈我國近代目錄學之發展（自鴉片戰爭至民國三十八年）〉，在其《中國目錄學史稿》（台北：丹青，民國七十五年），頁二二九至二六九。

元前七世紀，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 668-628 B.C.) 建大型皇室藏書於首府尼尼微，計收泥板文獻二萬五千餘件，存於陶罐之中，並依次置於架上。每一典藏室入口處牆壁之上，則設簡略目錄，刻錄泥板文獻典藏地點，以為指引之用，其型態頗似今日圖書館之排架目錄【註七】。考古學家另曾發掘主題或解題之屬的目錄，其上列有內文首段起始文字、重要子目、文字行數、及分類代號等款目【註八】。

據吾人所知，古埃及約在西元前三二零零年時，便已利用紙草植物製成柔軟的卷軸狀書寫材料，並以毛刷筆、墨水為其書寫工具。不過，在考古學發掘的諸多古埃及圖書館遺址中，泥板仍屬文獻記錄的主要媒介【註九】。古埃及的圖書館大多附屬於寺廟，館藏並得為僧侶使用，而其目錄之功能與型制則與古巴比倫的藏書目錄相仿【註一〇】。

西元前四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336-323 B.C.) 征服埃及，並於尼羅河三角洲之地中海沿岸，建立亞歷山大城 (Alexandria)。其後，托勒密王朝祖孫三代 (The Ptolemies)，以尊崇學術見譽於時，創建了亞歷山大圖書館 (The Alexandria Library)，並擇著名學者擔任館長一職；其珍視群書之精神不僅感昭了希臘世界眾多有識之士，更使館藏一度多達七十萬卷之譜，成為西方古代最重要的圖書收藏。亞歷山大圖書館第三任館長卡立馬科斯 (Callimachus, 260-240 B.C.) 主編了一部多達一百二十卷，名為《皮納克斯》(又名《各學科著名學者及其著作目錄》) 的館藏目錄，其上除記述作者生平、著作、各篇文字行數，以及內文首段起始文字外，更將藏書區分為修辭、歷史、法律、哲學、醫學、詩學、戲劇、與雜項等八類【註一一】。

【註七】·Johnson, Elmer D., 《巴比倫及亞述圖書館》，在其《西洋圖書館史》，尹定國譯，初版(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二年)，頁卅三至四十。

【註八】·Hanson, Eugene R., and Daily, Jay E., "Catalogs and Cataloging," in Allen Kent and Harold Lancour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0), p. 242-305.

【註九】·Gates, Jean Key., 《古代》，在其《圖書館事業導論》，高禎嘉譯，初版(台北：文史哲，民國六十九年)，頁三至十五。

【註一〇】·見【註七】。

【註一一】·Harris, Michael H., "Greek Libraries," in his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Compact textbook ed.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84), p. 32-47.

在希臘化時代，足可與亞歷山大圖書館相媲美的文獻典藏，非小亞細亞之波格蒙圖書館（The Pergamene Library）莫屬。創建者尤曼尼斯二世（Eumenes II, 197-159 B.C.）國王為仿效托勒密諸王的先例，遍尋希臘各地，以不同的威脅誘迫手段，訪求文獻典籍；凡無法入藏者，即著人抄繕。為成其複製之功，尤曼尼斯二世不僅自埃及引入大批紙草卷軸，更研發而成羊皮紙。經多年的徵集抄繕與編目著錄（仿卡立馬科斯之《皮納克斯》），波格蒙圖書館終以近二十萬卷館藏聞名於當世【註一一】。據史料記載，安東尼（Mark Antony, 82/81-30 B.C.）曾將波格蒙圖書館贈予托勒密王朝女王克麗奧佩脫拉（Cleopatra, 69?-30 B.C.）；後者繼之將館藏悉數移往亞歷山大城，使其終為「擁有舉世無匹圖書收藏之所在」【註一三】。

古羅馬自西元前二世紀即已出現私人藏書，而其型態、組織、與內容悉以古希臘之圖書收藏為圭臬。在橫越地中海，征服東方各國，並建立古羅馬帝國的進程中，古羅馬的統治者與軍事將領嘗將希臘以及小亞細亞各地之藏書作為戰利品，攜回國內，置於私人府第陳列。西元前三十七年，波利奧（Gaius Asinius Pollio, 76 B.C.-A.D. 4）在羅馬的自由神廟建立了羅馬第一所「公共」圖書館【註一四】，惟僅開放學者使用；西元一四一年，特拉貞皇帝（Emperor Trajan, 98-117）更以依拔佛羅戴斯（Epaphroditus of Chereonea, n.d.）之三萬卷私人藏書為基礎，創設了古羅馬帝國史上規模最大的烏爾皮亞圖書館（The Ulpian Library）；在西洋古代圖書收藏史上，其重要性僅次於亞歷山大圖書館與波格蒙圖書館【註一五】。

在其國運鼎盛時期，古羅馬帝國曾發展出一種新的文獻記錄形式，是即「抄本」（codex）；其所用之羊皮紙且可裝訂成冊，易於查檢閱讀，一如今日的書本。據史家考證，抄本得到普遍使用，當在西元四世紀之時【註一六】。古羅馬公私藏書

【註一一】：見【註一一】。

【註一二】：見【註九】。

【註一四】：Sera, Jesse H., "Up the Centuries from Sumer," in his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6), p. 13-41.

【註一五】：見【註九】。

【註一六】：見【註九】。

的最大特徵，係將圖書分為希臘文與拉丁文兩部，並依不同類別（細目已不可考）分類；在各類別之下，同一作者之著述皆併置排列。當時所通行之目錄計有二種：其一為分類目錄，按書卷之排架位置載列；其二則為書目目錄，架構則不越亞歷山大圖書館卡立馬科斯館長於皮納克斯中所立之範式【註二七】。

西元四七六年，羅馬帝國覆亡，西方進入中世紀時期；在爭戰頻仍、宗教禁錮、與學術窒息的交替影響下，文化發展呈現萎縮的景況。當北方日耳曼各野蠻部族席捲歐洲，西方文明崩潰之時，基督教的傳統與古典文化的遺產，卻在偏遠的修道院圖書館中得到妥善的保存與延續——圖書館藉其典籍收藏維繫文明傳承於不墜，於焉得到證驗。修道院是當時西方社會中的教育學術中心；數以千計的僧侶日以繼夜地伏案抄錄早期基督教與古希臘的典籍，並綴以華麗裝飾。西元五四零年，卡西歐多魯斯（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n.d.）在義大利南部維瓦留姆地區設立修道院，強調世俗文獻對基督教之意義，並收集各門學科圖書。在其重要著作《聖職機構與世俗文獻》中，卡西歐多魯斯即曾兼論典籍繕抄之管理、校正、與修護，並附名著書目解題【註一八】；是項書目解題在往後數百年間，甚且成為修道院選擇圖書的標準【註一九】。

中世紀書籍概以羊皮紙摺頁本為主【註二〇】；據悉，西元十二世紀時，紙草已無人使用。由於文獻得之不易，抄錄費時，各修道院圖書館間已設有嚴格之書籍互借措施。修道院的藏書大抵係依主題分類，亦有按書卷大小或出處來源區分者；部份圖書館且以字母代表類目，並將之刻於書架之上。修道院的圖書目錄並非為方便書卷檢尋利用而設；事實上，它只是一種為點查館藏而作之清冊而已。書目悉以作者或書名（或內文首行文字、或內文末行文字）之字母順序為排列準據【註二一】。

【註一七】：Johnson, Elmer D.，《羅馬圖書館》，在其《西洋圖書館史》，尹定國譯，初版（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二年），頁六十三至七十四。

【註一八】：Jackson, Sydney L., "The Middle Ages to 1225," in his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p. 31-69.

【註一九】：見【註一四】。

【註二〇】：陳威博，〈西方圖書館史〉，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廿五冊：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台北：錦繡，民國八十一年），頁五〇三至五〇九。

【註二一】：Johnson, Elmer D.，《修道院及大教堂圖書館》，在其《西洋圖書館史》，尹定國譯，初版（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二年），頁九十三至一〇六。

史家嘗謂，修道院圖書館曾維繫西方知識千年之久，然使知識發揮效用，進而為文藝復興奠立基礎者，則為大學圖書館【註二二】。自西元十二世紀末葉起，大學在西方各主要城市陸續興起；其圖書館藏書體制與修道院圖書館相仿，所相異者，則為其側重利用之發展導向。大學圖書館之典藏內容要以宗教文獻為主，並旁及哲學、醫學、數學、與天文學書籍；其目錄之編排、書卷之度置，悉按類目為之，並依字母順序排列。部份圖書館偶亦自行設計分類系統，作為辨識典藏位置之用，並將作者、篇名、與標題字混合排列【註二三】。

西元十五世紀是西方圖書館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原因有二：其一為文藝復興——古典文化學術研究的復甦，帶動了古代著作之蒐藏風潮；其二則為印刷術的發明——書籍印行數量的激增，使得圖書館不再為典籍繕抄所苦【註二四】。此一時期的圖書館已逐漸走出其度藏書籍的傳統角色，而朝有效推廣館藏利用的目標邁進；部份皇室圖書典藏甚且逐步蛻變，進而成為國家圖書館的基石。另一方面，圖書館從業人員亦已擺脫「書籍管理者」的地位，而以其飽學的內涵獲得社會極高的尊重【註二五】。西元十五世紀最重要的一部藏書目錄，出現於一四九七年，係屬英格蘭坎特伯利地區之聖奧古斯丁圖書館（St. Augustine's Library of Canterbury）所有；其內容計分三大部份：（一）載明書卷所在的藏書位置表格、（二）藏書排序清冊、以及（三）著錄完整劃一的藏書目錄主體【註二六】。

宗教論爭與農民起義曾使西元十六世紀的西方圖書館一度趨於式微；為數眾多的修道院圖書館漸次斂跡【註二七】。所幸，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等宗教改革人士所強調之「教育至上」以及「廣建優良圖書館」，不但滿足了

【註二二】：見【註一四】。

【註二三】：Johnson, Elmer D.，《早期大學圖書館》，在其《西洋圖書館史》，尹定國譯，初版（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二年），頁一〇七至一一四。

【註二四】：見【註一四】。

【註二五】：Johnson, Elmer D.，《中古時代的私人圖書館》，在其《西洋圖書館史》，尹定國譯，初版（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二年），頁一一五至一二六。

【註二六】：見【註八】。

【註二七】：Gates, Jean Key.，《活字印刷術》，在其《圖書館事業導論》，高禎燾譯，初版（台北：文史哲，民國六十九年），頁卅九至四十四。

宗教文化改革的要求，亦適應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需要，而終使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不致中落【註二八】。西元十六世紀西方目錄學的最大成就，即為康瑞德·葛斯納（Konrad Gesner, 1516-1565）於一五四五年所發表之《國際書目》；是書共收錄拉丁文、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典籍一萬五千種，採作者字順的字典式編排。其後，他在一五四八年及一五四九年，又完成了兩冊分類目錄，並附主題索引，將知識劃分為二十一大類。葛斯納在《國際書目》中著錄的款目，除作者、篇名、出版者、與出版年外，尚包括作品評介、作者生平、目次、及摘要等要項【註二九】。另一方面，拜印刷術日趨昌明之賜，印刷出版的圖書目錄亦相繼興起，而以一五六四年之法蘭克福圖書市場目錄開其端【註三〇】。

西元十七世紀初是人文主義教育鼎盛的時期，而圖書館在當時的社會中，更是居於不可或缺的地位，對於「確立思想內容條理，乃至破除迷信」等方面，貢獻甚鉅。十七世紀末葉，歐洲進入啟蒙時期。在知識覺醒的過程中，理論與實用科學獲得持續的動力泉源，展現新的精進風貌，進而造就了十八世紀快速的工藝技術發展，引發全面性的工業革命。生活日漸優裕的資產階級普遍熱衷於圖書的收藏；閱讀已成為一種時尚，並已逐漸深入西方社會的最低階層。許多規模宏大、典藏豐富的國家圖書館更在此時相繼設立；而各大學圖書館亦積極擴充圖書資源，期以豐富的館藏，作為古典學術的寶庫以及新興思潮的源泉【註三一】。澎湃於社會中的詢問探究風氣，使得系統化的、科學化的圖書組織管理益顯迫切。在此時代需求之下，圖書館事業乃逐漸成為一項專業化的工作；而卡布利歐·諾德（Gabriel Naude, 1600-1653）、約翰·杜瑞（John Durie, 1596-1680）、理察·班特利（Richard Bentley, 1662-1742）、以及卡特佛萊德·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註二八】· Jackson, Sydney L.,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his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p. 101-143.

【註二九】· 見【註八】。

【註三〇】· 彭斐章，〈目錄〉，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廿五冊：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台北：錦繡，民國八十二年），頁二八二至二八五。

【註三一】· Gates, Jean Key, 〈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在其《圖書館事業導論》，高撰熹譯，初版（台北：文史哲，民國六十九年），頁三至十五。

Leibniz, 1646-1716)等學者先後著書立說，肇劃圖書典藏管理之理論架構，更爲近代「圖書館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基礎【註三一、三三、三四】。

就西元十七世紀西方目錄學之發展而言，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之館藏目錄足爲表率。包德利圖書館於一六零五年正式開放時所設之印刷目錄，乃出自湯瑪斯·包德利(Thomas Bodley, 1545-1613)爵士與館長湯瑪斯·詹姆斯(Thomas James, n.d.)之手，計收藏書手稿二千餘種，分錄於神學、醫學、法學、及藝術四大類目之下。各款目悉按作者姓名(作者姓名不詳時，則按篇名關鍵字)順序排列，並錄有篇名、出版地、出版年、體積大小、與排架位置等資料。一六一三年，包德利圖書館另以手稿型式編錄作者索引一冊，以爲補充。七年後，包德利圖書館在更新其館藏目錄時，捨前版類目排列之法，而改採以作者姓氏爲準據之書目型態。圖書館史學家曾推崇此種劃一款目著錄的方式爲目錄學的里程碑，並將之視爲現代字典式目錄的濫觴【註三五】。

西元十八世紀中葉以降，隨著公共圖書館的次第興起，圖書館已能爲大多數民衆免費使用【註三六】。雖然各圖書館的館藏數量陸續獲得改善，其目錄架構大抵仍沿襲作者姓名順序之傳統，強調書籍排架位置；所不同者，概爲著錄款目之擴充(諸如作者生卒時間地點、版本、印刷者、與頁數等)、類目之增加、以及大量主題複分之應用【註三七】。手稿式或印刷式的

【註三一】·Hessel, Alfred,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his *A History of Libraries*, trans. Reuben Peiss (New Brunswick, N.J.: Scarecrow Press, 1955), p. 51-61.

【註三三】·Harris, Michael H., "European Libraries: Expan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o 1917," in his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Compact textbook ed.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84), p. 121-150.

【註三四】·Jackson, Sydney L.,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his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p. 144-201.

【註三五】·見【註八】。

【註三六】·Johnson, Elmer D. (公元一五零零年以後的公共圖書館)，在其《西洋圖書館史》，尹定國譯，初版(台北：學生，民國七十一年)，頁一六三至一八四。

【註三七】·見【註八】。

書本目錄仍係當時圖書館資料檢尋工具之主流；不過，部份歐洲的圖書館從業人員已逐漸採用卡片或紙片，作為編製與更新藏書目錄之主要工具【註三八】。十九世紀後半期起，由於圖書館藏書量及刊印書本式目錄的成本增加，繼之以美國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推出甚為成功的書目卡片印銷計畫，卡片目錄遂逐漸取代手稿式或印刷式的書本目錄，成為標準的圖書館書目控制與資訊檢索工具。在此期間，為使圖書館目錄製作理論化、標準化，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美國查爾斯·克特（Charles A. Cutter, 1837-1903）、史密森機構（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之查爾斯·裘威特（Charles C. Jewett, 1816-1868）、與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等，相繼提出編目分類通則【註三九】。另一方面，目錄卡片在製作、管理、維護，以及使用上所提供之便利性與彈性，亦促成了圖書館書目整理控制系統方面的多樣化發展；字典式目錄（按作者、書名、標題、與其它附加款目之字母順序依次混合排列）、分置式目錄（將作者、書名、標題、與其它附加款目分別依字母順序排列）、以及分類式目錄（以標題款目為主，並佐以作者、書名、與其它附加款目之索引）乃逐漸成為卡片編排方式之三股主要潮流。卡片目錄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使得圖書館所提供的館藏參考工具益趨完備；圖書館目錄之檢索功能亦因而得以充分發揮。

三、「三乘五」的迷題：圖書館目錄卡片之起源與演進

由於美國自十九世紀以來即位居全球圖書館事業發展之領導地位，多數人自然以為，圖書館以卡片為藏書目錄載體之觀念與作為乃源於美國。當然，此一主觀認知並非毫無根據，蓋美國圖書館事業與近代圖書館藏書目錄間一直存在著多層緊密

【註三八】：Cole, G.W., "An Early French General Catalogue," *Library Journal*, 25 (1900), p. 329-331.

【註三九】：British Museum. *The British Museum Code of Ninety-one Rules* (London: The Museum, 1839).

Jewett, Charles C. *Smithsonian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talogues of Libraries ... and Their Publication by Means of Separate, Stereotyped Titles, with Rules and Examples* (Washington, DC: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52).

Cutter, Charles A. *Rules for a Printed Dictionary Catalog*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6).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ndensed Rules for a Card Catalog* (Chicago: The Association, 1886).

關係；舉例而言，查爾斯·裘威特氏與梅威爾·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等目錄學家之理念塑造了近代全球圖書館編目業務之基礎架構；再者，美國國會圖書館本世紀初大力推展之目錄卡片銷售工作，更對書目卡片著錄的標準化與國際化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不過，就卡片目錄的發展與應用而言，美國卻遠較歐洲為晚。由圖書館學歷史研究資料觀之，卡片目錄最早當在歐洲的法國出現。

圖書館史學家桃樂賽·諾里斯女士認為，最早揭示以卡片作為圖書編目工具理念者，係十八世紀末之法國制憲議會（The French Constituent Assembly）【註四〇一】。法國大革命之後，所有私人、學校、及修道院的圖書館及其藏書俱皆收歸國有。一七九一年時，法國制憲議會頒佈多項命令，明確地指出全國聯合書目編錄之必要性；為求貫徹，它訂立了舉國通行之書籍編目著錄方式，是即全世界最早的國家圖書編目規則【註四一】。根據是項規則，各圖書館必須按「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的方式，將頂端載有連續號碼的厚紙片逐一置入相對應之館藏典籍內，而厚紙片上的號碼則露出於書冊之外，以便檢視；任何叢書、套書僅得有一張號碼片。厚紙片之材質、尺寸則與前此阿貝·羅茲爾（Abbe Rozier, n.d.）大力倡行之書目登錄用紙牌——頗似吾人熟悉之遊戲用撲克牌——相同。此外，法國制憲議會亦規定各圖書館須另以同一材質、尺寸之紙牌，為館內藏書製作二套登錄片。負責著錄作業的圖書館工作人員更須具備相當程度之拉丁語文造詣與文學修養。登錄片上必備之書目資料除書籍所在之圖書館館名外，尚包括：前述之書冊號碼、書名頁上記錄之正式書名、作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書冊大小、以及諸如特殊裝訂方式、插圖、或印刷字體等相關資訊。作者姓名或書籍主題關鍵字（用於作者名不詳時）悉以底線示之；登錄片則依據底線上文字之字母先後順序排列。依據法國制憲議會的指令，各圖書館於二套登錄片準備完妥後，當保留一套以為館內參考之用，並立即將另一套穿線（於卡片左下角圓洞處）包紮妥善，呈送至位於巴黎之革命政府，

【註四〇】· Norris, Dorothy M. *A History of Cataloguing and Cataloging Methods, 1100-1850, with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Ancient Times* (London: Grafton, 1939).

【註四一】· *Instruction pour Proceder a la Confection du Catalogue de Chacune des Bibliothèques sur Lesquelles les Directories Ont du ou Doivent Incessamment Apposer les Scell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791).

以爲建立全國性圖書聯合目錄之用〔註四二〕。根據統計，一七九四年四月份時，法國政府已徵得一百四十萬種（約三百餘萬冊）書籍之書目卡片。不過，值得注意者，係法國制憲議會頒佈圖書編目規則的最大目的，僅在於劃一全國圖書的書目資料著錄，絲毫無關書籍之分類；除了叢書、套書的單冊刊本得以集合併置一處外，法國各地圖書館之典冊排架方式並未因書目卡片之建立而有任何改變。不幸地，由於工程規模鉅大，專司其職的人力（計行政主管一名、書目編纂八名、編目員三名）不足，兼以部份圖書館的配合意願不高，而以其既有之書本式目錄呈送中央，法國政府全國聯合書目編錄的計畫並未成功〔註四三〕。

另一方面，史學家詹姆斯氏則以爲，目錄卡片的起源當較法國制憲議會下令製作圖書登錄片之時代爲早；它在阿貝·羅茲爾氏進行索引編錄工作之前，即已爲法國國立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大量應用〔註四四〕。雖然詹姆斯氏並未提出任何確切時間以加強其研究考証之可信度，他與諾里斯女士卻不一而同地強調了阿貝·羅茲爾氏對於十八世紀中葉以降圖書編目作業發展之重要貢獻。一七七五年時，阿貝·羅茲爾受命編錄並出版巴黎科學院（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一六六六年迄一七七零年間之論文出版品索引總目；爲求工作順利快速進行，他要求編目人員優先爲每一篇論文準備一套書目登錄卡片，而著錄之主要款目則包括作者、篇名中的關鍵辭彙、與論文出處等相關資訊。當卡片累積至相當數量時，編目人員即可依各款目字母順序將之排比羅列，並交付印刷，以製作書本型式的目錄，提供參閱。羅茲爾氏當時採用了單面印刷的方式，僅將書目登錄卡片排列刊印於紙張的一面，而紙張的另一面則維持空白，以爲日後著錄款目持續擴充之用〔註四五〕。

【註四二】·Pope, Elspeth, "Library Catalog Cards," in Allen Kent and Jay E. Daily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5), p. 448-464.

【註四三】·Jackson, Sydney L., "The Beginnings of Great Changes," in his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p. 274-331.

【註四四】·James, M.S.R., "The Progress of the Modern Card Catalog Principle," in H.P. Sawyer (ed.), *The Library and Its Content* (New York: H.W. Wilson, 1925), p. 331-338.

【註四五】·Prosser, R.B., "The Origin of the Card Catalogue: a Brief Not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 (1900), p.651.

與法國僅一水之隔的英國在書目卡片之應用方面似亦不落人後。一八二零年時，最早供一般大眾使用之圖書館卡片目錄即出現於倫敦電信工程師學會（The Society of Telegraph Engineers）之圖書室，而位於都伯林之三一學院（The Trinity College）圖書館則於一八二七年正式開放其卡片目錄，供師生查詢之用。此外，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亦於一八四一年設立了專供其內部工作人員參閱之排架目錄；此一目錄係由十一×四英吋之窄長型書目紙片所組成【註四六】。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卡片目錄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始於哈佛學院（The Harvard College）圖書館出現。事實上，哈佛學院早在一七二三年便印製了美國第一部書本式的圖書館館藏目錄；一八三三年迄一八三四年間，它更彙編了其書本式圖書館目錄的補篇。一八四八年，哈佛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將目錄補篇中的書目記錄分別剪貼於書目卡片上，製成工作參考用的卡片式目錄【註四七】。一八五七年，費城圖書館（The Philadelphia Library Company）率先開放其卡片目錄，供公眾使用【註四八】；哈佛學院則於一八六二年提供其卡片式作者、標題目錄，予所有學生以及社會中「有教養的紳士們」使用【註四九】。繼之，波士頓公共圖書館（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於一八七一年亦建置了專為社會大眾查檢用之館藏目錄，並於目錄櫃內部上緣備鐵條二支，以固定書目卡片【註五〇】。

一八五三年九月，卡片目錄以及相關的書目控制課題於美國全國性的「圖書館員會議」（The Librarians' Conference）中受到熱烈與廣泛地討論【註五一】。同年，史密遜機構之查爾斯·裘威特亦撰著專文，倡言建立一全國性之聯

【註四六】·見【註四四】。

【註四七】·Fiske, J., "The Librarian's Work," *Atlantic Monthly*, 38 (1876), p. 480-491.

【註四八】·Heiss, R.M., "The Card Catalog in Libr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76,"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38).

【註四九】·Harvard College. Committee of the Overseer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Overseers of Harvard College Appointed to Visit the Library for the Year 1863* (Boston: The College, 1864).

【註五〇】·見【註四四】。

【註五一】·Jackson, Sydney L.,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p. 332-403.

「三乘五」的迷題——圖書館目錄卡片之發展及其型制標準之演進

合目錄，並以架構於標準編目規則之卡片目錄為其基礎【註五一、五三】。當全國「圖書館員會議」再度於一八七六年召開時，為數甚多的圖書館已相繼採用了卡片目錄，足證卡片目錄之資料檢詢功能已為美國圖書館界所肯定。事實上，當時美國圖書館從業人員所至為關切者，已非檢索方面之課題，而係目錄卡片品質的提昇、標準格式之建立、以及協同製作之可行性【註五四】。

一八七六年三月間，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卸任館長麥克斯·穆勒（F. Max Muller）於倫敦《泰晤士報》發表專論，提出如下意見：（一）國家圖書館當肩負其國內圖書出版品之編目工作、（二）作者當提供其著作之基本書目資料片、以及（三）印刷妥當之書目資料片可用於維護圖書館之作者、標題目錄【註五五】。穆勒氏之建言反映出書目卡片的實用功能至少在英國一地已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而美國圖書館界所遭遇的卡片問題刻正於大西洋彼岸逐漸浮現。同年，美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賈思汀·溫瑟（Justin Winsor, 1831-1897）亦向出版業界提出呼籲，請求各出版商慎重考慮採行歐洲義大利出版界之作法，於發行書籍的同時，另附固定尺寸硬紙片刊印之書目資料片，以供圖書館界參考【註五六】。由於美國圖書館協會於是時業已擬妥制式書目卡片規格（五×十二·五公分），溫瑟氏之建議實具高度的可行性；然而，美國出版事業卻缺乏配合的意願。一八七九年時，知名的參考用書出版商包克公司（R.R. Bowker）開始於其圖書館採訪工具《出版家週刊》上刊登薄紙單面印刷的書名著錄片，以方便圖書館從業人員將之剪貼成目錄用卡片；由於當時《出版家週刊》之訂閱戶數量不足，此項工作維持尚不及一年即告中斷。其後，雖然美國圖書館協會與多所商業性公司行號亦曾積極推廣圖書館採購書目卡片的作法，此種預

【註五一】·Jewett, Charles C.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talogues of Libraries and Their Publication by Means of Separate, Stereotyped Titles with Rules and Examples*, 2nd ed. (Washington, D.C.: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53).

【註五三】·楊威理，〈1870-1945年的圖書館〉，在其《西方圖書館史》，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西元一九八八年），頁二零二至三三一。

【註五四】·見【註四一】。

【註五五】·Robinson, O.H., "College Library Administration," in U.S. Bureau of Education,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ir History, Condition and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6), p. 505-525.

【註五六】·見【註五五】。

先印製書目卡片的創意終未能為圖書館界所接受，作為擴充管理館藏目錄之有效工具；究其原因，乃(一)卡片上著錄之書目資料難以符合各圖書館之特殊需求，以及(二)卡片交寄時間經常延誤，致緩不濟急〔註五七〕。為因應館內參閱需求，圖書館——尤以大型圖書館為甚——只得自行印製書目卡片；較著名的實例包括：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匹茲堡卡內基圖書館 (The Carnegie Library)、芝加哥約翰·克里爾圖書館 (The John Crerar Library)、紐約公共圖書館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芝加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圖書館、密西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圖書館、以及昆士大學 (The Queen's University) 圖書館〔註五八〕。

十九世紀初期，手稿式或書本式目錄仍為圖書館館藏目錄之主要型式〔註五九〕；惟自後葉起，手稿與書本目錄逐漸走向式微之途。一八九三年，美國圖書館學家蘭恩 (W.C. Lane) 氏在一項針對美國圖書館界目錄應用狀況所作之調查中發現：(一) 卡片目錄已儼然成為目錄的主流，並被視為圖書館中之「必備品」；(二) 打字機應用於卡片目錄製作之現象已日趨普遍。他並確信：手稿式或書本式目錄於西方世界的發展已近尾聲；卡片目錄勢將取代傳統的手鈔本或印刷本圖書目錄，並成為圖書館資料檢索服務之主要工具〔註六〇〕。一九零一年時，國會圖書館於美國圖書館協會年會中正式宣佈其目錄卡片之印銷計畫。由於國會圖書館自一八九八年以來一直係採自行印製書目卡片 (四·五×七·五英吋) 的目錄管理方式，它願意以收取小額象徵性費用的方式，將其新編與改編書刊目錄卡片提供予全國各圖書館。國會圖書館推動是項計畫之主要出發點，乃「集中式」編目對各圖書館業務運作之經濟利益具有正面的影響，因為(一)為圖書館界編目將不致造成國會圖書館任何額外經濟負

【註五七】· Jordan, F.P. "History of Printed Catalogue Cards," *Public Libraries*, 9 (1904), p. 318-321.

【註五八】· 見【註四一】。

【註五九】· Ranz, James. *The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Catalogue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0).

【註六〇】· Lane, W.C., "Cataloging," in Melvil Dewey (ed.), *Papers Prepared for the World's Library Congress Held at the Columbian Exposit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6), p. 835-850.

擔，(二)如能善加利用國會圖書館提供之卡片銷售服務，各圖書館將不再因重覆編目而無謂浪費人力與財務資源【註六一】。梅威爾·杜威於得知此一訊息後即曾慨然指出：「吾人期盼了廿餘年的措施——吾人一直夢想得到的服務——現在終於要實現了」【註六二】。

次年，國會圖書館卡片印銷計畫正式實施後，便即受到美國圖書館界熱烈的回應；與之簽署訂購合約之各類型圖書館更是逐年持續增加【註六三】。其後，許多國家的國家圖書館、編目中心、或圖書館協會等亦相繼跟進，提供性質類似的服務，承擔了集中編目與目錄卡片印銷的責任，進而開啟本世紀圖書館事業特有的發展方向；其中較為重要者，計有：德國的普魯士國立圖書館（The Prussian State Library）、奧地利的國家圖書館（The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東德的德意志圖書館（The Deutsche Bucherei）、前蘇聯教育部所隸之中央編目局（The Centralized Cataloguing Bureau）、以色列圖書館協會（The Israel Library Association）、以及丹麥的皇家圖書館（The Danish Royal Library）等【註六四】。在我國民國締建之初，清華大學圖書館及南洋大學圖書館即率先使用卡片式目錄【註六五】。上海商務印書館自民國十八年起，更開始排印目錄卡片，並隨其《萬有文庫》系列叢書出售；而民國二十五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亦分別著手推動其館藏書目卡片之編印工作【註六六】。一九六五年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一項國際性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多數國家皆設有全國性之編目中心以及書目卡片印行流通計畫，且印刷式目錄卡片對各國圖書館日常資訊業務之推展著有貢獻【註六七】。

【註六一】· U.S. Library of Congress. *Annual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01* (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1901).

【註六二】· "Report of the ALA Publishing Board. Remarks by M. Dewey," *Library Journal*, 26 (1901), p. 128.

【註六三】· 見【註四一】。

【註六四】· 見【註四一】。

【註六五】· 見【註一】。

【註六六】· 見【註六】。

【註六七】· Giljarevskij, R.S.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Catalogue Cards: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Paris: UNESCO, 1969).

四、圖書館目錄卡片型制之標準化

雖然美國並非最早使用目錄卡片的國家，她對書目卡片標準規格之確立卻居功厥偉；事實上，今日全球各圖書館使用之「三乘五」書目卡片，即為美國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中一項極重要的產物。

卡片式目錄於歐美諸國逐漸流行之初，圖書館界對於書目卡片之格式標準並無共識；無論是書目著錄內容，抑或卡片之規格與使用材料的質地，各圖書館俱皆各行其道。圖書館與圖書館間所用之卡片尺寸固不一致，同一圖書館內書目卡片之格式或尺寸甚且各不相同。大體言之，早期的圖書館目錄卡片係將手抄之書目資料紙片黏貼於硬紙卡片上，或將書本式圖書目錄中之各款書目資料剪貼於厚紙卡片上所製成。以史密遜機構與哈佛學院的圖書館目錄為例，由於各單件書目資料的內容多寡不一，目錄卡片之大小即隨之不同，致使卡片體積不是過於寬大，便是趨於細長。此一混亂現象在某些性質特殊的卡片目錄中甚且更形嚴重；舉例而言，波士頓圖書館「內容著錄」卡片的尺寸即為其一般目錄卡片的五倍〔註六八〕。下表所列者，係十九世紀時美國重要圖書館所採用之目錄卡片規格：

圖書館名稱 (年代)	目錄卡片規格 (單位：英吋)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1852)	四·五×六·七五、五·五×六·七五
國會圖書館 (1864—1898)	五·五×六·七五
國會圖書館 (1864—1898)	四·五×七·五
史密遜機構 (1848)	四×六
安姆赫斯特學院 (1873)	三×六(標題目錄)、二×四(作者目錄)
哈佛學院 (1861)	二×五
波士頓圖書館 (1876前)	二×五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1876前)	二×五

資料來源：見〔註四十二〕

有鑒於卡片規格零亂所造成的諸多不便，美國圖書館協會所屬之圖書館合作委員會（The Cooperation Committee）即曾提出五×十二·五公分之書目卡片標準規格草案。此項建議於一八七七年得到修正；美國圖書館協會隨即正式決定採用長七·五公分、寬十二·五公分（二·九五×四·九二英吋）的卡片，以為圖書館目錄用卡片的標準規格；圖書館界簡稱之「三乘五」卡片即由此而來〔註六九〕。不過，美國圖書館協會所提書目卡片標準規格之約束力似乎不彰；蘭恩氏在其一八九三年之調查中即曾發現，十九世紀末美國圖書館界所用之書目卡片依然大小不一，惟約略介乎七·五×十二·五公分與五×十二·五公分之間〔註七〇〕。另一方面，處事力求嚴謹確實的梅威爾·杜威對「三乘五」的通稱卻不予苟同。他以為「三乘五」一名係圖書館文具用品製造商忽略事實、不求精準的結果，蓋圖書館界從未使用過三×五英吋的書目卡片。當時，圖書館文具廠商已售出數以百萬計的「三×五英吋」目錄卡片；杜威因而嚴正地指出，圖書館從業人員若將「三×五英吋」與標準「二·九五×四·九二英吋」規格之卡片混合排列，其目錄工作的效率必將受到影響〔註七一〕。

一旦書目卡片之應用日漸風行，圖書館界所面臨的另一項課題，即為如何維護卡片之耐用性與抗損性。讀者大量密集の利用極易造成卡片之損壞，圖書館卡片目錄之妥善管理與細心維護因而益形重要。經常檢索圖書館卡片目錄的讀者當不難發現，卡片毀損的症狀不外乎上緣折角地帶壞爛以及卡片表面髒污二種。就十九世紀時一般圖書館的經濟及人力資源而言，重新製作並抽換受損之書目卡片實有其執行上的困難。為謀解決之道，諸如史密遜機構裘威特氏與波士頓公共圖書館余賴福（N.B. Shurtleff）氏等圖書館界知名人士，即曾呼籲各圖書館使用硬質紙張製成的卡片，並提出解決方案。雖然美國圖書館協會亦深感解決此一問題的迫切性，並考慮將卡片用紙的品質列入書目卡片標準規格內，它卻苦無任何技術上的數據資料，以為研究參考之用〔註七二〕。

【註六八】：見【註四二】。

【註六九】：見【註四二】。

【註七〇】：見【註六〇】。

【註七一】：Dewey, Melvil, "Cards" *Library Journal*, 54 (1929), p. 223.

【註七二】：見【註四二】。

自一八七七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公佈目錄用卡片之標準規格以來，美國圖書館界使用之書目卡片即呈現材質參差不齊現象。除了少數人士私下進行小規模的卡片材質研究調查外，多數圖書館從業人員皆相信，由百分之百破布紙製成之目錄卡片具高度持久性、耐用性，能夠禁受大批讀者長時期的翻閱【註七三】。在目錄卡片紙質標準付諸闕如的情況下，美國圖書館協會所隸之圖書館技術小組（The Library Technology Project）即曾規劃了一系列的書目卡片材質耐用性測試程序。經過長期針對讀者檢索卡片目錄方式進行分析比對，圖書館技術小組對於造成卡片褶曲、彎扭、或變形等受損狀況之原因獲得了深入的瞭解；同時，它亦發現低酸、純木棉紙質的卡片最適用於圖書館公用目錄【註七四、七五、七六】。值得吾人注意者，係此一結論乃以「研究性質」圖書館卡片目錄之最低維護需求為依歸，蓋研究圖書館之書刊俱屬永久性典藏，其目錄卡片因長期大量使用而造成之毀損速度自當較其它性質圖書館卡片目錄之毀損速度為快。一九六九年，圖書館技術小組透過美國國立標準局（Th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訂立了圖書館目錄卡片之材質標準；書目卡片之纖維成份、重量、表面光滑度、切割方式、紙張厚度、及酸鹼值等技術細節自此獲得明確規範【註七七】。

雖然圖書館界迄未針對目錄卡片的顏色訂立任何標準，絕大多數的目錄乃由白色或淺象牙色書目卡片組成。不過，近代圖書館從業人員往往使用不同顏色的書目卡片，以區分不同型態的資料——尤以非書資料為主。此種作法之起源當可溯自十九世紀中葉；其時，部份圖書館即曾有有色卡片，作為區分藏書種類之用，或作為著錄小冊子藏品書目資料之用。一八六零年代初期，費城美國哲學學會（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圖書館選用了多種顏色卡片，以為館內藏書所在位

【註七三】：見【註四二】。

【註七四】：Clapp, Verner W., "LTP: the Rattle in an Infant's Fist," *American Libraries*, 3:7 (1972), p. 795-802.

【註七五】：Piez, Gladys T., "Library Technology Project - Today and Tomorrow," *Libri*, 14:4 (1964), p. 330-336.

【註七六】：Piez, Gladys T., "LTP: How It Serves Libraries," *Library World*, 66 (April 1965), p. 248-249.

【註七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USA Standard for Permanent and Durable Library Catalog Cards: Z85.1-1969*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1969).

「三乘五」的迷題——圖書館目錄卡片之發展及其型制標準之演進

置的標記；而梅威爾·杜威掌理安姆赫斯特學院（The Amherst College）圖書館時，更以不同顏色的書目卡片作為作者與標題目錄之前導卡，以方便讀者檢詢【註七八】。本世紀初，愛爾蘭籍圖書館員馬修·彭恩（Matthew J. Byrne）曾於英國圖書館協會（The Library Association）之正式定期刊物中發表短文一篇，建議圖書館界將有色卡片移作「應時讀物」或「過時資料」編目之用；如此，「無論是欲淘汰過時讀物的圖書館從業人員，抑或亟於覓得最新資料的讀者，僅需檢索目錄中之有色卡片即可」【註七九】。彭恩氏之建言雖未得到當時圖書館界之重視，其創意卻提供了現代圖書館從業人員重新構思有色書目卡片用途的參考方向。

圖書館書目卡片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即為其底部的圓孔。卡片目錄興起之初，圖書館從業人員並無在書目卡片上穿孔的習慣；其後，由於管理上的需要，部份圖書館即責成其編目人員於卡片上鑿孔，以便結繩網繫。十九世紀後葉，哈佛學院與羅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圖書館首度於其目錄抽屜內使用細鐵條，以求卡片穩固。由於穿孔之位置係在卡片左下方，編目人員於製作書目卡片時，便必須適度地調整文字縮格位置，使着錄內容向右延伸【註八〇】。「三乘五」成為圖書館書目卡片標準規格之後，由於著錄空間驟然縮小，而必須著錄的書目資料不變，圖書館界便將穿孔位置移往卡片正下方，以為因應。事實上，美國國立標準局於其一九六九年頒訂之目錄卡片材質標準中，亦曾就書目卡片底端穿孔位置提出建議性規範：圓孔之直徑宜為七·九公釐，且當位於卡片正下方距底緣四·八公釐處【註七八】。

五、結語

本文至此已就卡片目錄之發展及書目卡片型制格式標準之建立提出撮要說明；惟限於許多重要參考資料之不易取得，筆

【註七八】：見【註四二】。

【註七九】：Byrne, Matthew J., "Coloured Cards for Ephemeral Literatur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0 (1918), p. 46.

【註八〇】：見【註四二】。

【註八一】：見【註七七】。

者仍無法解開許多圍繞在「三乘五」書目卡片周圍的謎團。舉例言之，打字機具各項規格——標準鍵盤（一八七四年）、大小寫字母（一八七八年）——確立之後，圖書館界在目錄卡片製作方面受到何種影響？再者，一八七七年美國圖書館協會訂定目錄卡片標準規格之際，為何捨其它尺寸卡片而就七·五×十二·五公分的「三乘五」卡片？不容否認地，隨著館藏數量的增加，卡片目錄快速膨脹當為必然之趨勢。「三乘五」卡片所能提供的著錄空間實屬有限；由圖書館運作的經濟效益層面觀之，著錄面積較大的書目卡片（例如大英博物館、國會圖書館、與史密遜機構曾分別採用之十一×四英吋、四·五×七·五英吋、及四×六英吋卡片），不更適於有效管制目錄的成長？事實上，卡片目錄所受到的最大批判，莫過於它在快速成長後可能達到的「規模」。一九四四年，圖書館學家佛利蒙·萊德（Freemont Rider）即曾大膽提出警告：圖書館的藏書量每十六年便增加一倍，卡片目錄呈現驚人擴增的必然性自是不言可喻【註八二】。他問道：有朝一日，圖書館界是否將會淘汰卡片目錄【註八三】？

圖書館事業之所以被歸類為社會科學之一支，乃在於它是為了滿足社會知識傳承之需要而生。圖書館的基本社會責任乃在於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度藏人類智慧的結晶——書刊典籍，進而使之得到有效的利用。一言以蔽之，書刊典籍能否在圖書館中獲得有效利用的先決條件，即在於圖書館是否具備良善的書目控制及管理方法，並提供完備的書目組織檢索工具。良善的書目控制管理意謂著圖書館從業人員依據標準編目規則對其館藏遂行完整之著錄，而完備的書目組織檢索則代表了圖書館館藏內容得於任何型式的目錄、索引中獲致正確無誤呈現。書目卡片自十八世紀末首度於法國出現以迄今日，其演進及發展已歷二百餘載。無疑地，由它所組成的卡片目錄堪稱圖書館史中最成功的書目資料檢索工具；或許除了電腦化的書目整理控制方式外，吾人實難覓得其它足可在實用、持久、時效、或易於維護管理等特性上與之相當的書目組織與檢索系統。著名的印度圖書館學家阮甘納森（S.R. Ranganathan）氏曾於本世紀初提出「圖書館科學五大法則」，以謀現代圖書館事業理論基礎之

【註八二】·Rider, Freemont. *The Scho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arch Library* (New York: Hadham Press, 1944).

【註八三】·Rider, Freemont, "The Possibility of Discarding the Card Catalog," *Library Quarterly*, 8 (1938), p. 329-345.

莫立，並作為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資訊服務上求新求變可資遵循之方向【註八四】；其所列第二與第三法則——「每位讀者有其書」、「每冊書有其讀者」——即為一體之兩面，旨在引導圖書館使用者於浩瀚的典籍收藏中正確無誤地覓得所需之資料。阮甘納森氏對「圖書」與「讀者」間關係之連接，委實已為圖書館卡片目錄之角色及功能提供了最佳的註腳。

【註八四】·Gopinath, M.A., "Ranganathan, Shiyali Ramamrita," in Allen Kent and Harold Lancour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25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8), p. 58-86.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Three by Five Puzzle: A 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ibrary Catalog Card

Sung Chao-l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library has its genesis in man's need for transmitting knowledge; the progression of civilization is realized as man continues to add to his knowledge base what he learns and discover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accumulated sum of man's knowledge exists in the form of monographic records that constitute th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library. As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monographic records and the user who has a need for these resources, the library has as one of its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bibliographic records and the provision of appropriate utility for effective and speedy retrieval. Towards this end, the librarian has over the centuries been able to come up with many diverse instruments for rendering bibliographic control, a term that is generally used with reference to a bibliographic index or catalog. The card catalog that we know so well is one such apparatus, and its emergence in Western librarianship in the 18th century certainly ushered in a new era in bibliographic organization. Not only did it gradually replace the printed catalog that had been so popular since the 16th century, it had been embraced by an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libraries and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 worldwide library phenomenon. While it may not be the best bibliographic system, the card catalog has, to be sure, many positive attributes: it is fairly easy to use; it can be simultaneously consulted by many users; it provides more than one access point; it can be brought up to date quickly; to name just a few. Yet, when the library user, whether casual or frequent, fumbles through the cards and enjoys the benefits that the card catalog has to offer, has he ever paused for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how the card catalog has become what it is today? Or, for that matter, how those 3-by-5 cards that make up the entire catalog have become what they are today?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literature of library

history, so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library catalog card can be outlined, in the hope that the librarian may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arsenal and that the interested library user may garner som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what he has to deal with if he is to fully explore the wealth of the library.

Keywords: Library catalog 圖書館目錄

Catalog, card 卡片目錄

Catalog cards 目錄卡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七七 through 九八.